

韦承贻 字贻之，咸通八年（867年）登第。诗二首录其中一首。

策试夜潜纪长句于都堂西南隅

褒衣博带满尘埃，独自都堂纳卷回。
蓬巷几时闻吉语，棘篱何日免重来。
三条烛层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
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
自莲千朵照廓明，一片升平雅颂声。
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月画难成。

韦 冰 唐末邕令。诗一首《和三乡诗》：

来时欢笑去时哀，家国迢迢向越台。
待写百年幽思层，故宫流水莫相催。

韦 遵 后周起居郎，诗一首《题施磷画竹图》：

枯籜危根缴石头，千竿交映近清流。
堪珍仲宝穷幽笔，留得荆湘一片秋。

韦 鼎 湖南人，诗一卷，今存一首《赠廖凝》：

君与白云邻，生涯久忍贫；姓名高雅道，寰海许可人。
岳气秋来早，亭寒果落新；几回吟石畔，孤鹤自相亲。

韦 庄（约836-910）字端己，杜陵（今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人，诗人韦应物的四代孙，唐朝花间派词人，词风清丽，有《浣花词》流传。曾任前蜀宰相，谥文靖。

韦庄系唐初宰相韦见素后人，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为人疏旷不拘，任性自用。广明元年（880年）四十五岁，在长安应举，正值黄巢军攻入长安，遂陷于战乱，与弟妹失散。中和二年（882年）始离长安赴洛阳。中和三年（883年）春，四十八岁作《秦妇吟》。不久避战乱去到江南，五十八岁回到长安，一心想想要应试，以伸展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乾宁元年（894年）五十九岁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乾宁四年（897年），时年六十二岁，被“宣谕和协使”李洵聘为书记，同至西川，结识了西川节度使王建，回长安后，改任左补阙。天复元年（901年）六十六岁，应王建之聘入川为掌书记。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唐。唐亡，力劝王建称帝，王建为前蜀皇帝后，任命他为宰相，蜀之开国制度多出其手，后终身仕蜀，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七十五岁卒于成都花林坊。

韦庄诗词都很有名，诗方面今传《浣花集》十卷。韦庄曾经家陷黄巢兵乱，身困重围，又为病困。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在洛阳，著《秦妇吟》。长诗《秦妇吟》反映战乱中妇女的不幸遭遇，



在当时颇负盛名，但诗中对黄巢农民起义军颇多诋毁。后人将《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所作词语言清丽，多用白描手法，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情凝词中，读之始化，以至弥漫充溢于脏腑。其词无专集，散见于《花间集》、《尊前集》和《全唐诗》等总集中，近人王国维、刘毓盘辑为《浣花词》一卷，凡五十四首，盖取其诗集为名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四）、（五）、《浣溪沙》（五）、《应天长》（二）、《荷叶杯》（一）、（二）、《清平乐》（三）、《谒金门》（二）、（三）、《河传》（二）、《天仙子》（二）、（四）、《诉衷情》（一）、《女冠子》（一）、（二）、《木兰花》等。韦庄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的重要词人，并称“温韦”。温秣丽，韦清新。诗人韦应物四世孙。至韦庄时，其族已衰，父母早亡，家境寒微。

韦庄一生经历，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仕唐时期。广明元年（880年）他在长安应举，适值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未能脱走，至中和二年（882年）春始得逃往洛阳，次年作《秦妇吟》。后去润州，在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幕中任职。光启元年（885年），僖宗还京后，又因李克用逼迫，出奔凤翔、兴元。韦庄出于拥戴唐室之忱，离江南北上迎驾，中途因道路阻塞折返，后在婺州一带客居。景福二年（893年）入京应试，不第。乾宁元年（894年）再试及第，任校书郎，已年近60。后昭宗受李茂贞逼迫出奔华州，韦庄亦随驾任职。乾宁四年，奉诏随谏议大夫李询入蜀宣谕，得识王建。后又在朝任左、右补阙等职。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是诗歌。今存《浣花集》所收作品即止于光化三年（900年），此后无诗作留存。

后期为仕蜀时期。天复元年（901年），他应聘为西蜀掌书记，自此在蜀达10年。天佑四年（907年），朱全忠灭唐建梁，韦庄劝王建称帝，与之对抗，遂建立蜀国，史称前蜀。他被王建倚为心腹，任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制定开国制度。后官至吏部侍郎平章事。在蜀时，他曾于成都浣花溪畔杜甫旧居重建草堂作为住所。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是词。今存韦词大部分作于后期。

韦庄在唐末诗坛上有重要地位。清代翁方纲称他“胜于咸通十哲（指方干、罗隐、杜荀鹤等人）多矣”（《石洲诗话》），郑方坤把他与韩偓、罗隐并称为“华岳三峰”（《五代诗话，例言》）。他前逢黄巢农民大起义，后遇藩镇割据大混战，自称“平生志业匡尧舜”（《关河道中》），因而忠于唐王朝是他思想的核心，忧时伤乱为他诗歌的重要题材，从而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悯耕者》、《汴堤行》对战乱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睹军回戈》、《喻东军》、《重围中逢萧校书》对当时屯居洛阳的援军残害人民、掳掠妇女的丑恶行径作了谴责，同时又对他们拥兵自重、未能积极镇压起义军表示不满。而《铜仪》、《洛北村居》、《北原闲眺》、《辛丑年》等诗，则反映了他对唐室“中兴”的热切期待；《闻再幸梁洋》、《江南送李明府入关》等诗，表示了他对离乱中的君主、皇族多所眷念；《咸通》、《夜景》、《忆昔》等作，更抚今追昔，

为唐王朝的衰微唱出了深沉的挽歌。他又有一些出色的怀古诗，如《台城》、《金陵图》、《上元县》等，在对南朝史迹的凭吊中，也寄寓着他对唐末社会动乱的哀叹，情调凄惋。此外，他还有一些诗如《思归》、《江外思乡》、《古离别》、《多情》等，反映了他长期四处飘泊，求官求食的境遇和心情。他的写景诗，如《题盘豆驿水馆后轩》、《登咸阳县楼望雨》、《秋日早行》等，取景疏淡，思致清婉，也有特色。他以近体诗见长。律诗圆稳整赡，音调响亮，绝句包蕴丰满，发人深省；而清词俚句，情致婉曲，则为其近体诗的共同风格。

韦庄的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此诗长达1666字，为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诗中通过一位从长安逃难出来的女子即“秦妇”的叙说，正面描写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称帝建国，与唐军反复争夺长安以及最后城中被围绝粮的情形。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一方面对起义军的暴行多所暴露，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义军掀天揭地的声威及统治阶级的仓皇失措和腐败无能；一方面揭露了唐军迫害人民的罪恶，另一方面又夹杂着对他们剿贼不力的谴责。它选择典型的情节和场面，运用铺叙而有层次的手法，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矛盾，布局谨严，脉络分明，标志着中国诗歌叙事艺术的发展。韦庄因此诗而被称为“秦妇吟秀才”。由于某种忌讳，韦庄晚年严禁子孙提及此诗，也未收入《浣花集》，以致长期失传。20世纪初始在敦煌石窟发现。

韦庄与温庭筠又是花间派中成就较高的词人，与温庭筠并称温韦。温、韦词在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别，不外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流连光景。但温词主要是供歌伎演唱的歌词，创作个性不鲜明；而韦词却注重于作者情感的抒发，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5首，学习白居易、刘禹锡《忆江南》的写法，追忆往昔在江南、洛阳的游历，把平生漂泊之感、饱经离乱之痛和思乡怀旧之情融注在一起，情蕴深至。风格上，韦词不象温词那样浓艳华美，而善于用清新流畅的白描笔调，表达比较真挚、深沉的感情，如[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女冠子]“四月十七”、“昨夜夜半”等。他有些词还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用直截决绝之语，或写一往情深，或写一腔愁绪。如[思帝乡]“春日游”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于率直中见郁结；[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的“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以终老异乡之“誓”，更深一层地抒发思乡之苦。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韦端已词，似直而纤，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许昂霄《词综偶评》评韦词“语淡而悲，不堪多读”，都指明这一特点。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韦词高于温词，指出“端已词情深语秀”，“要在飞卿之上”；“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已之词，骨秀也”，也是从这点着眼的。但韦词间有艳褻语，为其不足处。

下面摘录清·蘅塘退士选编《唐诗三百首》中韦庄的诗作供读者鉴赏：

章台夜思

清瑟怨遥夜，绕弦风雨哀。
孤灯闻楚角，残^①月下章台。
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来。
乡书^②不可寄，秋雁又南回。

【注析】：①殊：绝。②乡书：指家书。

【评析】：这首诗是怀人思乡之作，在概是寄给越中家属的。诗以“夜思”为题，开篇却不写思，而写夜听瑟声，接着写听到悲凉的楚角，勾动游客怀“思”。诗的后半，即为所“思”的内容：芳草已暮，韶华已逝，故人不来，乡思难寄。最后点出时当秋节，更令人秋思不断。诗中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恨，读来不胜悲凉凄楚，叫人肠断。

金陵图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①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②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注析】：①六朝：指吴、东晋、宋、齐、梁、陈。②台城：也称苑城，在南京玄武湖边，原为六朝时城墙。

【评析】：这是一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诗的首句写金陵雨景，渲染氛围；二句写六朝往事如梦，台城早已破败；三、四句写风景依旧，人世沧桑，触景生情，借景寄慨，暗寓伤今。语言含蓄蕴藉，情绪无限感伤。

韦 晏（生卒不详）自号白云先生，宋代上林（今广西上林县）人，博闻强记，有书楼之称，但应举不第，隐居罗洪洞，寿至百余岁。《和陶弼思柳亭韶》是目前所仅见的唯一一首诗，道：

白云罅隙结婚缘，半夜镁铳舞醉仙。
五百年来得书记，罗洪溪畔浴沂年。

这首诗以轻松笔调表现了超尘脱俗的隐士生活的浓厚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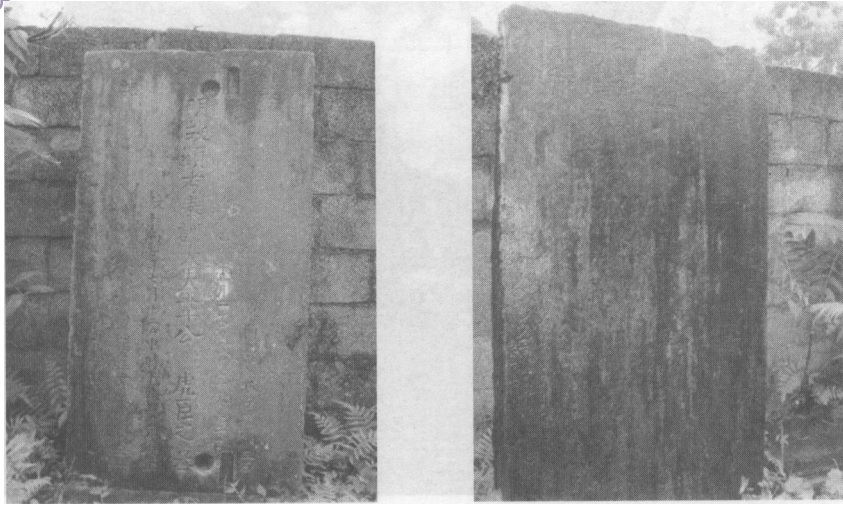
韦 奎（生卒不详）字君用，明代横州（今广西横县）人，弘治八年（1495年）举人，任大庾、秀水二学训导，曾任升宁乡知县，清明得士民爱戴。只留有《仙槎亭》一诗于世，兹录于下：

寂寂槎亭天地中，萧晏山色试秋容。偶来避世寻仙境，恨不乘槎到月宫。
几点翠云排雁字，一溪流水映芙蓉。好怀都为西风适，野鹤山猿笑醉翁。

韦虎臣墓及东兰县城九曲河益寿桥遗址

在广西东兰县三石镇纳腊村前面有一块空地，里面立有石碑、石象、石麒麟、石马、石狮等许多石雕，那就是埋葬着一位明代抗倭英雄韦虎臣的一块墓地。可惜“文革”中已被破坏，现只能看到部分残缺遗物。正如东兰县原常务副县长韦伙灵诗云：天空云飞云聚，大山默默无语。凭吊呵，墓在何处？两块劫后遗存的断碣残碑，数件

缺臂少腿的石人石兽，在诉说五百年前的抗倭悲伤史迹。如图：



韦虎臣系东兰土州第二十二任知州韦正宝的长子。史书记载及相关学者考证，明朝袭任东兰土州知州韦正宝、韦虎臣、韦起云、韦应龙一家祖孙四代，相继率领“狼兵”（又叫徭兵），前往闽粤江浙一带抗击倭寇，为保卫国家、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家祖孙四代有的阵亡疆场，有的遭受奸臣陷害，有的含冤离世。他们为保卫祖国海疆前仆后继，流芳千古，精神永驻，万世长存。

倭寇，即古代日本海盗。日本古称倭奴国，“倭”指个子矮小的意思，“寇”指盗贼集团。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武装的日本海盗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对中国沿海及朝鲜进行有组织的劫掠，通称为倭寇。



原东兰县常务副县长韦伙灵（左起第10）与韦氏宗亲拜谒武夷侯韦虎臣墓遗址

明弘治至正德年间（1499-1521年），倭寇不断侵扰我国闽粤江浙沿海，大肆掠夺财物，抢劫商船，屠杀居民，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朝廷官军虽然出战，但屡遭败绩，无功而退，于是倭患猖獗，人心惶遽。在国家危难的紧急关头，明朝启用张经为总督东南军务大臣，他曾到过广西，素知广西“狼兵”精通武艺，作战勇敢，认为“寇强民弱，非借兵不可。”^[7]便奏请朝廷下令征调骁勇善战、不畏强敌的广西狼兵，远赴东南沿海抵御倭寇的侵扰。

1509年，东兰土州知州韦正宝奉令征调。韦正宝（1478-1510），生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系韦祖铨长子。韦祖铨系明时广西东兰土州人，赴广西布政司任事。明弘治二年（1489年），有昆乡、清潭、南乡、三岔、伏屨等地匪乱，韦祖铨奉命征剿，大获全胜，受朝廷嘉奖，并拨清潭、南乡、三岔、伏屨等地归东兰土州管辖。韦祖铨也因擢用为东兰土州知州。韦正宝16岁时曾于明弘治年间（1494年）奉旨代父率东兰狼兵北伐，协助贵州巡抚邓廷瓚讨伐都匀苗乱，擒获酋首张世禄，钦蒙圣恩准袭东兰土州知州，后屡建奇功，敕封“北平伯”^[8]。韦正宝承袭乃父任东兰土州知州之前，随父习武，练就一身武艺，胸有甲兵，掌握了韦氏土司的传统兵法。他任职后，又教幼小的长子韦虎臣习文练武，缮甲治兵，饰车骑，习驰射。韦虎臣自幼喜读诗书，尚文崇武，稍长即专门师从五台山云游僧人、进士出身的觉空禅师在东兰武篆银海洲专习兵机韬略击技。由于韦虎臣勤奋演练，精明强干，膂力过人，武艺高强，好打不平，助寡扶弱，深受父亲钟爱。

明正德四年（1509年），广东潮州、惠州抗倭前线告急。日本海盗集团占据惠州九连山筑寨，建立据点，骚扰周边各州县，官军久攻不克，损失惨重，要求征调善于山

地作战的东兰土州“狼兵”前来助战，朝廷准奏。韦正宝率领的狼兵临行前慷慨激昂地发出誓言：“此行也，誓不与贼俱生。”^[9]

明正德四年冬，东兰土州知州平北伯韦正宝接到紧急军情，即率东兰、南丹、那地等土州“狼兵”2000多人，日夜兼程，于正德五年（1510年）正月赶到惠州行辕报到。14岁的韦虎臣，体格健壮，少年老成，胸怀大志，精通《六韬》、《三略》，不忘忠悃，恳切请缨，随父远征，获得恩准。韦正宝率领东兰狼兵，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快马加鞭，20多天到达梧州，直指广东潮州、惠州，汇合粤省抗倭官兵，征剿敌寇。韦正宝“身先士卒，屡歼顽敌，战绩卓著，斩寇首级三百”；广西狼兵，为国抗倭，英勇无畏，不怕牺牲，争先恐后，舍生忘死，欲血奋战，威震敌胆，倭寇“闻之惧，……坚壁不敢出”^[10]。

1510年初，韦正宝率领广西狼兵，从惠州转战广东九连山（今连平县境），与敌寇激战8昼夜。由于倭寇受到重创，便变本加厉，更加疯狂，“狼兵”攻进九连山前沿阵地时，遭遇日本海盗箭矢与飞石的袭击。韦正宝身先士卒，独当矢石，蹈厉奋发，不幸中箭，身负重伤。主官受创，“狼兵”各自为战。近战搏杀，倭刀对狼矛，犹如砍瓜切菜，日本海盗显然占了上风。不到一个时辰，东兰“狼兵”近1000人惨死倭刀之下。唯独校尉黄文光跑得快，幸免于难，回军营报讯。

随父出征的韦虎臣（时年15岁），在军营中听到父亲中箭落人敌手，近1000人阵亡的凶讯，如晴天霹雳，哭诉于主帅营门前，要求主帅出兵救援。但主帅畏敌如虎，噤若寒蝉。韦虎臣求告无望，怒发上指，悲愤交加，回归本营，披挂上阵，召集剩余人马，紧急动员，人人头扎孝布，誓与日本海盗决一死战。

韦虎臣虽然年轻，但曾跟随五台山僧人觉空禅师在家乡银海洲习武，不但膂力过人，而且精通排兵布阵之术。当时倭寇以二人为伍，并肩作战，持倭刀之锋前，削狼兵之刀矛，狼兵多为所伤。韦虎臣将狼兵以三人为一组，一人持盾、短刀，一人持长戈，一人持竹矛，竹矛中空，注入石灰粉。三小组由一什长统率，互为犄角，遇敌有进无退。调整完毕，一声令下，在营“狼兵”1000多人倾巢出动，抱定必死的决心，杀上九连山。

日本海盗头仗得胜，趾高气扬，故伎重演，哪知遇上煞星。只见韦虎臣头扎白巾，手持大刀，冲在前面，敢挡者死。经过调整的“狼兵”队伍也显示出独特的战斗力。持竹者将长竹伸出，倭兵不知是计，挥刀来砍，竹内石灰粉飞扬，倭寇官兵眼不能张，持盾者一手持盾，一手握刀，打滚前进，专砍敌脚。持戈者当胸挺刺。倭兵的二人并肩式被“狼兵”的三人犄角式瓦解，加上石灰的威力，战不几时，海盗全线崩溃，退入九连山寨。韦虎臣看准时机，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攻克了九连山寨，杀死了倭寇首领，全部歼灭了山上的倭寇，将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父亲从敌阵中抢了回来。由

于伤势过重，得不到及时医治，韦天宝不幸在惠州行营殉难，为国捐躯，时年 32 岁。朝廷体恤其为国捐躯，“嘉其忠烈，矜悯备至，命以冠带礼优，厥嗣虎臣临政”^[11]，准许韦虎臣接任东兰土知州，护送父亲寝柩回东兰，立墓志褒扬。

韦虎臣扶父寝柩回东兰，安葬在东兰太平哨岩石纳腊山坡上。朝廷着赐进士出身文林郎提督直隶学校监察御史黎凤等三人分别撰文、书丹和篆额，永远褒扬。其墓碑有记：“时东广（原文如此——作者注）惠潮等府，寇作剽掠横恣。正德己巳冬，奉调征剿，身先士卒，勇于就义，劲气冲肝，秋霜烈日争严，矢石亲冒，直抵九连山巢，一鼓而擒之，阵伤，庚午春三月二十三日薨于惠州之行营”^[12]。这位爱国土司就这么把热血洒在疆场上，用生命谱写一曲抗倭卫国的壮烈之歌。

韦虎臣，乳名犀牛，壮语绰号“怀岁”，即“牛王”之意。“虎臣”是皇帝恩赐的名字。据民间流传，韦虎臣虽年仅 15 岁，但他少年老成，魁梧奇伟，容貌殊异，浓眉大眼，目光如炬，舌长如牛舌，伸出口外能舔到鼻孔，因此得了个“岁牛”的绰号。少年倜傥、风华正茂的韦虎臣蒙荫继任父亲之职，即第二十三任东兰知州土司。年少的韦虎臣，血气方刚，志存高远，缮甲治兵，胸有韬略，不忘民族仇、父亡恨。韦虎臣利用知州之便，在武篆哨银海洲山岗群峰上开辟跑马道，设立演武厅，招募壮家子弟，充实和扩大狼兵队伍，劈刀舞剑，跑马射箭，习武学艺，秣马厉兵，养精蓄锐，韬晦待时。

正德八至九年（1513-1514 年），韦虎臣奉命率领东兰狼兵赶赴闽、粤沿海，协同当地军民抗倭，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屡战屡胜，攻无不克。特别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武夷山战役，成绩辉煌，可歌可泣。韦虎臣在武夷山战役中，及时总结当年攻克九连山的战斗经验，改变“三人一组”的狼兵战法，“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割首之人，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之责，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绝伦也。”^[13]他指挥狼兵迎击敌人时，一“伍”齐向前，执枪者冲在前头，执弩者在两侧守卫，而“执弩者口衔刀，手接矢，矢尽投弩刀刃相见，夹击俱备”^[14]。因此，狼兵在战场上，常常能“以少击众，十出九胜，天下莫强焉”^[15]。韦虎臣率领的东兰狼兵，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立大战功，朝廷大喜，赐予韦虎臣“哀孝忠勇”4 字金匾，敕封为武夷侯^[16]。

韦虎臣在武夷山战役的胜利，完全是他对狼兵战法的娴熟运用。每次战斗，他都率先垂范，劈刀挥剑，冲锋在前；狼兵上下，同仇敌忾，个个摩拳擦掌，誓与敌人决一死战。明人郑若曾在《江南经略》评论说：“狼兵此法，可以为用兵之要诀”^[17]。东兰狼兵“七人为伍”战法是用兵打仗的重要战术，是东兰狼兵联系实际、别具一格、行之有效的独特兵法。《粤西丛载》载：狼兵“一人赴敌则左右大呼夹击，一伍争救之。一人战没，左右不夹击，立斩。一伍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斩。退缩者斩。敌

以金帛遗地拾者斩。”^[18]这种使人寒栗的严刑峻法，造就了一支视死如归的铁军。也就是说，韦虎臣能结合战时情况，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狼兵战法，娴熟自如，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明朝正德年间，中国可说是多事之秋。闽粤沿海一带，倭寇仍很猖獗。正德九年（1514年）冬，刚刚平息武夷山倭患后，韦虎臣又奉命马不停蹄出征抗击倭寇于闽粤沿海，转战千里，所向无敌，击破倭寇于雷州。正德十一年（1516年），聚歼倭寇于海南岛。这时，王守仁被尚书王琼特举升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巡抚赣闽粤各省。东兰狼兵所到之地，“军纪严明，秋毫无犯”^[19]，赢得了沿海人民的称赞，在几次大战役中，群众“以刀矛送之”，狼兵越战越猛，韦虎臣又屡建奇功，雷州半岛沿海一带，还流传盛赞他和东兰狼兵之歌：“将如虎，兵如狼，敌寇尽丧胆，保国卫家邦。”^[20]韦虎臣屡建奇功，战绩赫赫，王守仁更从心底里喜欢和赞叹。

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韦虎臣率领的东兰狼兵凯旋班师，回到广州。捷报传到京城，群臣朝贺，明武宗朱厚照喜曰：“朕今得广西犀牛狼兵，东南沿海无忧矣！”因赐名犀牛“虎臣”^[21]。从此，“虎臣”这一名称在朝廷流传开来，传遍东兰，名扬广西，全体壮家狼兵钦佩崇敬，高山仰止，东兰广大民众称颂赞美。

1516年，年仅22岁的韦虎臣，威名远扬，功高震主，为奸臣严嵩所妒忌。严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奸臣之一^[22]。史书记载：“严嵩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己，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严嵩看到韦虎臣的赫赫战功，顿生排除之心，设计阴谋陷害。他弄权进谗，上奏皇上：“韦虎臣狼兵天下无敌，屡建大功，兵权在手，如不早除，必为后患”^[23]。明武宗朱厚照风流好色，纵情享乐，荒废朝政，怪诞无耻，荒淫暴戾，是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由于皇上昏庸无能，不辨真伪，听信谗言，使严嵩的阴谋得呈，他以劳军庆功为名，要韦虎臣班师进京，设宴施毒换酒。韦虎臣不幸殒命。

韦虎臣遇害后，其妻王氏（福建人），设身处地，疏通关节，恳请抗倭将领、时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王守仁上奏朝廷，诉述冤屈。王守仁上奏皇帝，历数严嵩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排除异己、招权纳贿、为所欲为、奸诈诡秘、陷害忠良的罪行，诉述韦虎臣冤天屈地。朝廷明白个中缘由，后悔已来不及，不敢违背狼兵众怒，为韦虎臣雪洗不白之冤，从优抚恤。广西狼兵部属将韦虎臣寝柩运回东兰太平哨岩石纳腊，寻觅牛眠之地，侦知龙穴宝山厚葬。韦虎臣妻室王氏奉旨伐石表墓栽松楸，旌表碑铭二座，敕赐修制石人、石马、石狮、石虎、石象、石麒麟等百余件丧品，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列于墓前，昭示皇恩，迪维子孙，继往开来。

韦虎臣遇害后，按土司世袭的定律，由他的长子韦起云继任东兰土州知州，即第二十四任知州。

韦起云，号葵轩，生于武篆哨之旧州土司署。韦虎臣为国捐躯时，韦起云年仅三岁，由叔父韦虎麟代理州务，长大后承袭知州，亲理州务。年幼的韦起云，在土司家的优越环境中，人小志大，折节读书，尚文习武，刀枪拳剑，熟能生巧，《六韬》《三略》，娴习在胸。他牢记祖父抗击贼寇、为国捐躯的业绩；他不忘父亲痛歼倭寇、事业未竟的遗愿，立志成才，报效国家，为民除害。

韦起云参加抗倭战争，当属明朝抗倭后期，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明王朝权衡利弊，仍下令征调骁勇善战的广西狼兵，远赴东南沿海抵御倭寇的侵略。

正当倭寇猖獗、国家危难、沿海民众蒙受浩劫之时，过了不惑之年韦起云，忧心重重，茶饭不思。何时才能为国分忧？他自幼磨剑沥血，身怀绝技，精通刀枪，胆识过人，胸有韬略。正当国家用人之际，他跃跃欲试，请缨远征。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韦起云奉旨携长子韦应龙并率东兰、南丹、那地三土州壮家狼兵 1000 余人，会同田州瓦氏夫人率领的广西狼兵共 7500 多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抗倭大军，离开广西，奔赴江浙。广西狼兵万里驱驰，日炙风吹，饱经霜雪，露宿风餐，担饥忍渴，途经广东、江西、浙江、江苏等省，跋山涉川数千里，饿体冻肤而不顾，历时半年多，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春到达江浙抗倭前线。

广西抗倭大军以瓦氏夫人为参将，以韦起云为协副将。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四月二十八日，瓦氏夫人以韦起云为前锋，领兵参加了著名的嘉兴、石塘湾、王江泾战役，与其他官军、士兵携手并肩，协同作战，大败倭寇，斩敌首级及溺死 4000 余人；又在六泾坝的战役中，斩敌首 300 余级，烧毁倭寇战船 300 余艘。

这是征倭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也是抗倭战争的转折点。五月初五，余寇 300 余人途径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县境），又被广西狼兵伏击截获，闻风丧胆，全军溃散，伤亡惨重。此后，广西狼兵多次参战，屡建奇功，威震东南，倭寇丧胆。自此，倭寇只能对我国东南沿海虎视眈眈，垂涎三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贸然侵扰。

此次江浙抗倭战争，韦起云智勇双全，武艺高强，战无不胜。当时由于奸臣严嵩弄权，纵容其义子赵文华虚构事实，冒报功劳，陷害功臣，抗倭名将张经被害下狱，韦起云愤恨不平，但无可奈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奸臣严嵩心怀鬼胎，整日揣测：他毒害韦虎臣，丧尽天良，罪逆深重，其子韦起云必不放过；今日建功立业，日后进京奏报，时机成熟，子报父仇，难逃其咎。贼人胆虚的严嵩急向嘉靖皇帝朱厚熄谎报军情，编造东兰、南丹、那地三土州土瑶民作乱造反的奏折，韦起云不宜留在江浙抗倭前线。外患稍定，内乱又起，心急如焚的皇帝，不问青红皂白，即下诏韦起云带兵回籍治理乱象。



广西东兰县城益寿

韦起云辞别瓦氏夫人时，泪如雨下说：“敌寇未灭绝，无面回州园。”^[24]他非常无奈地回到东兰，又未见土瑶民作乱，才知道受骗上当，怒不可遏。不久，瓦氏夫人也愤而生疾，便向朝廷告假还乡，在广西田州病逝。佞臣当朝，蒙骗皇上，忠良受害，国无宁日。由于长期抑郁不平，韦起云也愤懑成疾。嘉靖三十五年（1557年），韦起云在东兰州署病故，享年四十三岁。他含愤离世时告诫长子韦应龙说：“祖父仇未报，抗倭抗到老，父冤恨未消，后人要记牢。”^[24]

韦应龙，韦起云长子，随父抗倭，征战各地有功，蒙军门赏给冠带，与父同掌署事；不负重望，屡次征战，斩获贼首立功，于嘉靖四十三年（1563年）升授东兰土州知州，即第二十五任知州。嘉靖四十五年（1565年）因防守桂林失陷而被革职。隆庆三年（1569年）奉调征剿广东、广西等地倭寇及匪贼有功，蒙两广总督军门刘钊符上奏朝廷，获得恩准，恢复前职。以后数战中，奋发砥砺，熏天吓地，视险若夷，战绩辉煌，功勋卓著，均蒙赏赐。东兰县城有座“益寿桥”，（右如图）位于东兰县县城马鞍山南麓，跨九曲河，为三拱结构石桥。长38.7米，高8.5米，宽4.6米；两端为石级，桥面两旁以石条作栏，系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东兰州土司韦应龙为其母金氏六十寿辰募款所建，故名“益寿桥”。据考证该桥是广西境内建筑年代较早的两座石桥之一。历来筑路修桥，造福人民，积德累功，都是千秋大业，为后人所爱戴与崇敬。韦应龙光宗耀祖，千古流芳，世人景仰。

韦景儒（1775-1857）字仰山，修仁（今广西荔浦县）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举人，晚年设教于永宁州（今广西永福县）。著有《韦仰山先生杂著》，收文19篇，诗20首，联9幅。其诗多咏乡间生活，其中《乙酉八月山中五十贱辰作》收出家境窘迫，功名不就的喟叹，除此没有更多别的现实内容。

韦懿贞 清末桂林女诗人，遗有《椅松居烬存吟草》，为民国初年排印本，是其第三子唐开济纂辑。书前有李良年民国元年（1912年）序，李守陶民国五年（1916年）题词，集本有唐开济后记。后记说，其一生作诗甚多，但从不由此自炫，大都随写随毁；开济外出就傅，始以一二见示，欲求其全稿，遭严词拒绝，现存诗。为开济窃录收藏。此集除百余首诗外，还有词数首，赋2篇。李良年、李守陶赞其诗巧夺天工，温厚平和。

韦康元 字异常，号襄臣，科举不得意，改而从军，50岁时将生平所作编成集，诗中有不少作品常抒发科场失意之苦痛以及对秀丽山川的赞美。有民国三年（1914年）据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版排印，又有黄华表收藏民国二十年（1931年）手抄本，乃南海李文荣所辑。

韦天宝 字介圭，号洞斋（1787-1820），武缘（今广西武鸣）陆斡韦静村人。《武鸣县志》称赞他“自幼聪慧，初入塾，授以经即能成诵，性不羁，嚶嚶然以古人为必可

学，年十九补弟子员”^[25]。其父韦有纲，举孝廉，品行正，颇有才学，闻名乡里，教育子女，孜孜不倦。在严父的阿护训导下，韦天宝勤奋好学，多方求教，遍寻良师，累积知识。他曾求学于上林名士张鹏展，在其门下受训，矻矻终日，奋发攻读，学业长进。期间，韦天宝曾写下诗篇：“万卷书犹少，龙威拥百城。论文思正始，考道验生平。晚节松称茂，寒香菊倍清。卅年朝市迹，史册付公评”^[26]。以表示他对恩师张鹏展的钦佩、崇敬与景仰。

韦天宝聪敏勤勉，博学多才，小有名气。他的民本思想突出，时刻关心民瘼。清嘉庆二十一年（1817年），韦天宝已到而立之年，才华出众，踌躇满志，决心为民请命、为国效力。时有凤山韦姓土官仰慕其文才，卑词厚礼聘请他到凤山为师爷，意在惑世沽名。赴任途中，他看到山区农村的荒凉与贫困，写下了《抵凤署感作》，描述了十九世纪前期广西壮族人民在土司统治下的悲惨景况，表达自己的无限哀怜。到达凤山官署，联想看到沿途农村破败、徭役繁多、赋税沉重、民不聊生的境况，以为土官也是清贫可矜的。后来知道并非如此，实际上土官奢侈贪婪，醉生梦死，不问政事，无视民情，他又非常愤慨，又写了一篇《凤山救弊条议》，洋洋数千言，建议改革凤山弊政，减轻民众负担，发展农业生产。凤山土官对这些“进言”不但充耳不闻，而且极为不满，老羞成怒，但又不敢明里发作。韦天宝聪敏过人，早已察觉，大失所望，于是愤懑而辞官归里。这大约是三十岁左右的事情^[27]。

回到故里，韦天宝独发孤愤，胸怀大志，刻苦攻读。他潜心理学，酷爱先儒之书，特别是宋明理学；所著诗文，均多发于宋明儒学。他为人正直，深为乡里所重，方志称他“向义日勇，文章日醇”^[28]，评价颇高。经过寒窗攻读，孜孜矻矻，终于学有所获，一举成名，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进士，领授四川某县知县。清道光元年（1821年），韦天宝奉钦命赴任。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四川成都时，终因旅途劳顿成疾，仅数月便病故，时年34岁。

韦天宝一生虽然短暂，然而他勤勉奋发，好吟善咏，著书立说。著有《斗山书院学规》1卷，惜已佚；《士先器识论》一文载于1915年《武鸣县志》卷十。平生创作诗文，其子韦丰华收集辑录为《存悔堂遗集》6卷，现仅存1-3卷；韦丰华编辑的《今是山房吟余琐记》以及民国《武鸣县志》载有其诗10余首。

韦天宝留下的精神财富：

士先器识论

赐进士 韦天宝

士不易为也，亦不可不为。为士者，必有为士之实故。不易为，不为士，则无以自立于天地古今之际，故不可不为。然为士者，非别有所为而为之，亦取其所自有者而为之。诚以其所自有者，固自大而远也。古人云：“士先器识”。器识者何？即大学

之所谓明德也。朱子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惟其能具众理，故其为器也大；惟其能应万事，故其为识也远。盖自天生人即予之以五常之性。性载于心。众理者，性之理也，而心具之。故心者，所受之器也，心之量无所不包。万事者，性之事也。诗所谓有物，有则也，而心应之。故心者，所从知之识也，心之灵无所不通。然器与识，亦非分而为二也，自人之受于天者而言，则有器，因有识，由诚而明也；自人之尽人合天者而言，则必有识，乃有器，由明而诚也。故大学必先正心，正心必自格物致知始。士者，入大学者也。大人之学至于平天下而极，平天下之道，归于絜矩。矩者，器也，絜之者，识也。絜矩者，非他，慎德而已。慎德者，非他，明明德而已。以明德为矩，则天德之施，王道之行，皆在吾识中也。然而此非一日之故也。正吾心，以葆吾明德，则其量自大。而意不能诚，则心虽欲正而不能。欲诚意以正心，必先知其所当，诚之为善为恶，是故致知在格物。物者，即吾性吾命之理，散殊见于万物者也。格之，则物之理，皆仍化为吾心之理。知之所以至，而意可诚，识之所以大也。见其大而心自泰，器之所以宏也。由是而性命之理，得足以絜矩，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斯平天下之事，可举而措之，裕如矣夫。至于能平天下，乃无愧于大人之学，乃足为士也。故曰：“士先器识。”而不然者，士尚可问乎哉？或曰：子之所谓器者，乃以大学平天下而言得，无言大而夸乎？而非也。大学以平天下为极，而其实皆自吾心而推之，此之谓絜矩之道，即所谓器识也。絜矩之道，无问于内外，无间于远迩。苟致力于此即穷，而在下则慎独以求自谦。其行己也，不过入孝出弟，素位而行。其应事接物也，不过一介不与，一介不取，持守坚定，而其胸臆之间，已有天下为己任之思。此其器已大，其识已远也。三代之上如伊尹，圣门之中如颜曾是也；三代以下如武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亦庶几近之。而要皆自致力于身心性命中来也，而要皆其所自有也。此则士之所为器识也。如此，乃足以为士，故士不易为也。必如此为士，乃能自立于天地古今之际，故士不可不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者，器之大而能受也，毅者，识之远而能守也。夫子讥管仲器小，盖以其未尝致力于此也，或曰：致力奈何。曰：居敬以为主，而其工夫之次第，亦如大学所谓格致诚正者而已。^[29]

这篇论文，主要是阐明“士”阶层即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为治理天下出谋献策这类人才如何认识事物，锤炼自我，修养德行，为人处世，获取真知。全文仅仅924个字，但却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主要有：器识心性的主体思想，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絜矩慎德的品行修养，素位持守的处世之道，弘毅居敬的修行途径。这可以看作是韦天宝建构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纲要。如果他不英年早逝，可能会有一些大作问世，阐发他的整个思想。

韦天宝《士先器识论》留下的主要精神财富：

(一) 器识心性的主体思想。《士先器识论》开宗明意：“士不易为也，亦不可不为。为士者，必有为士之实故。不易为，不为士，则无以自立于天地古今之际，故不可不为。然为士者，非别有所为而为之，亦取其所自有者而为之。诚以其所自有者，故自大而远也。古人云：‘士先器识。’ [30]”这篇短文，首先提出了问题，并指出为“士”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为“士”必须从自我修养做起。整段文字的意思是说，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为治理天下而出谋献策的“士”这类人才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修练养成的，但又不能不把自己修养成为“士”。要把自己修养成为“士”这类人才，必然要有成为“士”的道理。如果认定修养自己成为“士”不容易而不去刻苦努力，那就无法自立于天地古今，只能任人摆布，无所作为。所以是不能不把自己修养成为“士”的。然而，要把自己修养成为“士”，不能通过别的什么途径，必须从自身所固有的东西开始。如果能从自我固有的东西去寻找成为“士”的原因，那就必然胸襟宽宏，志向远大。所以古人说，要想成为士，必须首先懂得器与识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道理。

道与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明确表述道与器的对待关系，始见于《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的对待关系，实即是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问题。而道在器先，还是器在道先？或道寓于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程颐说：“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密者，用之源）也”^[31]。在程颐看来，作为形而下的阴阳是从形而上的道产生的；阴阳是气，是从道派生出来的。朱熹继承了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32]。在朱熹看来，天地万物生成，既有理，也有气。但气是从理派生出来的，是构成万物的具体材料。朱熹又说：“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33]。朱熹认为，虽然器中有道，但不可以器为道。譬如，人们在热天时，都要用扇子来取凉。扇子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这个具体的事物是“形而下之器”。那么，扇子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说，在这个具体扇子之前，已经存在扇子的理。扇子是这样做的，应该这样用的，都是由于那个“形而上之理”。有这理，才有具体事物^[33]。很显然，朱熹所谓“形而上之理”，是把人的认识中的观念、理念抽象和绝对化的结果。理念、观念本来是外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理念、观念的形成必须具备外部世界和人的头脑这两个条件。朱熹却把理念、观念与产生它的条件相分离，而把理念、观念说成是一种独立存在的、高高凌驾于化生它的事物之上的东西，即“形而上之理”。这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到了明清之际，王船山提出了“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根据这个命题，如果没有具体事物这个“器”，就没有事物的“道”即规律。为了论证“道”离不开“器”，王船山对传统哲学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说：“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无形无下，人所言也。无形无上，显然易见之理”^[34]。在王船山看来，作为“形而下之器”的具体事物，并非“无形”，而是“有形”的，这是指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具体事物；而“形而上之道”，同样是“非无形之谓”。所谓“非无形之谓”，是说形而上的“道”，由形而下之“器”决定的。王船山这样解释器与道的相互关系，与程颐、朱熹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相互对立的。因而是唯物主义的。

韦天宝笃信程朱理学，在“器识”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上，受程朱思想的影响很深。他在《士先器识论》中说：“然器与识，亦非分而为二也。自人之受于天者而言，则有器，因有识，由诚而明也；自人之尽人合天者而言，则必有识，乃有器，由明而诚也。”这里的“诚”与“明”是两个重要的概念。“诚”，就是诚实，即意念诚实。《大学》有诚意篇；朱熹也说过：“诚其意只是实其意”^[35]。王阳明也很重视“诚意”^[36]。

“明”，就是彰明。《大学》中多处提到“明明德”，“明德”，意为彰明美德。韦天宝在这里所说的器与识，是不能“分而为二”的。从人自天生以来就固有的自然天性来说，内心有了各种具体事物，因而也必然具有各种事物的知识，由于意念诚实而自然明了事理；从人经过刻苦学习、尽心努力而达到人的自然天性来说，那就必然有了认识事物的道理，自然就有了具体事物，由于明了事理也就意念诚实。很显然，韦天宝的这些观点，与朱熹的“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韦天宝在论述器识关系的同时，阐明性心的思想。他说：“器识者何？即大学之所谓明德也。”“明德”，就是要把人所固有的德性彰明起来，使之发扬光大。这是《大学》的根本原则。韦天宝接着引用朱熹的话：“朱子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虚灵”，朱熹认为是“心之本体”^[37]。在朱熹看来，要彰明的德性是“得乎天”即人人生来俱有的，因而心之本体是清楚而并不糊涂愚昧的。具备众理，足以应付万物。如见非义而羞恶，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尊贤而恭敬，见善事而叹慕，都是内在之明德的外在表现。如果这种德性被物欲所蒙蔽，便昏暗不明，好像太阳被乌云遮住，镜子被蒙上灰尘一样。看似昏暗，而本体的光明并未曾消灭，所以人们必须“明德”即重视内心修养，经常做擦拭镜子的工作，使光明的德性永远保持光明和纯结。韦天宝引用朱熹这段话，表明他赞同朱熹这些观

接着，韦天宝进一步阐明他的性心思想：“盖自天生人，即予之以五常之性。性载于心。众理者，性之理也，而心具之。故心者，所受之器也，心之量无所不包。万事者，性之事也。诗所谓有物，有则也，而心应之。故心者，所从知之识也，心之灵无所不通。”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的“五常”之性即仁、义、礼、智、信这些德性是与生俱来、先天就有的。而五常的德性载于心。这样立论之后，他从两方面进行论证阐发：从众理来说，所谓理，都是五常的德性之理，而这些都是心所具有的。所以心包括“器”

这些有形有状的具体的万事万物，心是“无所不包”的。从万物来说，所谓具体的万事万物，都是五常德性的万事万物，而这些都是心本来就固有的。所以心本来就具有认识万事万物的知识即道理，心是“无所不通”的。韦天宝关于“心之量无所不包”，“心之灵无所不通”的思想，与宋代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和明代王守仁“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这表明，韦天宝在建构他的器识心性的主体思想时，既赞同朱熹的理学，也吸收陆王的心学。

韦天宝这样论证之后，在“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中，进一步说：“致知在格物。物者，即吾性吾命之理，散殊见于万物者也。格之，则物之理，皆仍化为吾心之理。”就是说，所谓具体的万事万物，即是自我德性本来固有之理，而又分散化生为具体的万事万物而已。要穷尽的事物之理，都仍然化生为自我心中之理。韦天宝的这些思想，与朱熹的“性即理也”^[38]、“一心具万理”^[39]和王阳明的“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39]、“心物同体”^[40]的理念，何其相似乃尔。

可见，韦天宝的器识心性之主体思想，深受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影响。

(二) 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韦天宝在建构其器识心性的主体思想之后，进一步阐述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他说：“故大学必先正心，正心必自格物致知始。士者，入大学者也。大人之学至于平天下而极。”在这理，必须首先考察什么是大学。在古代，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朱熹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至庶人之子弟入小学，而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自小入学，教授文字之学，掌握文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子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也。”可见，在中国古代，小学与大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小学偏重于掌握文字知识，而大学则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有了小学的基础，才有大学的深造。而学习的对象是有区别的，小学是庶人子弟均可入学，而大学的对象则是：天子的长子，这是将来要嗣位为天子的；天子的众子，这是将来要建国封侯的；公卿、大夫、士的嫡长子，他们是有采邑的。这些人才能入大学，学习治人的理论和实践。而庶人子弟只有才学俊秀者才能入大学，学而优则士，去治国安民^[41]。韦天宝在这里所说的“士者，入大学者也”，是指才学俊秀的庶人子弟。

韦天宝把进入大学要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概括为“大人之学至于平天下而极”，即进入大学要致力于学习、掌握、穷尽治理平天下之道理。所以，他认为，进入大学必须首先“正心”。正心，就是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而无私欲邪念。而要“正心”，必须从“格物致知”开始。韦天宝的这一观点，与大学之要义是相互吻合的。

对于“格物致知”，韦天宝的观点与朱熹有许多接近或相似之处。他说：“欲诚意以正心，必先知其所当，诚之为善为恶。是故致知先之。而致知在格物。”意思是说，

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以达到端正自己之内心而无私欲邪念的目的，必须首先使自己固有的知识恰当合理，知道什么是善良而崇尚并坚持，什么是丑恶而鄙视并反对。所以，“致知”应是首要的，必须放在第一的地位。只有“致知”即推致我心固有的知识以达到“全知”“真知”，才能穷尽事物之理，做到万事万物无所不知。因此，韦天宝又说：“知之所以至而意可诚，识之所以大也。见其大而心自泰，器之所以宏也。由是而性命之理，得足以絮矩，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斯平天下事，可举而措之。”这里的“絮矩”是什么意思呢？“絮”为测量、计度；“矩”为方，指制作方形的规矩。“絮矩”，就是执矩以度天下的方形，即以己之意度人。整段话的意思是说，对事物知道得越全面越彻底，意念就可以诚实，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也就越大。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越大越多，内心就越泰然自若，从而器量也就越宏大。这一切都是自我内心德性的固有之理。以此来度量人，就可以通晓天下一切，从而类推知道万事万物之理。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可以真正把握治理平天下之事的大道理，并制定出平天下的方略和措施，付诸行动。

韦天宝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与朱熹从“格物”到达穷“理”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或者是近似的。

（三）絮矩慎德的品行修养。韦天宝在《士先器识论》这篇短文中，多处提到“絮矩”、“絮矩之道”“慎德”、“慎独”。他说：“平天下之道，归于絮矩。矩者，器也，絮之者，识也。絮矩者，非他，慎德而已。慎德者，非他，明明德而已。以明德为矩，则天地之理，民（应为“万”）物之原，皆在吾器中也。以明明德为絮矩，则天德之施，王道之行，皆在吾识中也。”从前文已知，“絮矩”意为执矩以度天下一切的方形，即以己之意度人，可引申为道德上的示范、榜样作用。“慎独”意为独处时要十分谨慎。“慎德”意为自己独居之时要更加谨慎小心，切实注意道德修养。整段话意思是说，能使天下太平的道理，来源于“絮矩”之道，即推己度人，在道德上带头垂范，树立榜样。矩，是制作方形的规矩，也就是有形体的事物，絮为测量、计度，也就是知识。而要做到推己度人，在道德上带头垂范，树立榜样，当自己独处的时候更加要谨慎小心，时时刻刻注意品德修养，不使邪念欲望潜滋暗长。除此没有别的办法。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一丝不苟地谨慎自己的行为，修养品德，不是去做其他别的什么，只有把人固有的光明完美之德性彰明起来，使之发扬光大而已。因此，以彰明美德作为如方形的规矩，这样，天地间的一切道理，万事万物的一切本原，都在我心中了。（“皆在吾器中也”的“器”作“心”解，因前文曾有“故心者，所受之器也。”）如果以自己光明完美之德性来推己度人，并带头垂范，树立榜样，那么，天下光明美德的实施，君王道统仁政的执行，我都能认识并化生为自己原来就固有的知识体系之中。

韦天宝的这些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絮矩之道”和慎独思想的影响。关于“絮

矩之道”，《大学》道：“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42]。这就是说，所谓使天下太平，在于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其原因是：君主能尊敬孝养老人，那么，人民就会盛行孝道。君主能敬重长辈，那么，人民就会盛行敬长友弟之风，等等。所以，君子应当做到推己度人，在道德上带头垂范，树立榜样。可见，絮矩之道，就是推己度人、在道德上带头垂范之道。《论语·卫灵公》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消极方面的推己度人之道。《论语·雍也》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是积极方面的推己度人之道。推己之心以度人，和执矩以度天下之一切的方形一样，这就是絮矩之道。

慎独观念，是指人自己独处的时候更加要谨慎小心，自觉修养品德。《中庸》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43]。其意是说，在幽暗的地方，大家不曾见到隐藏着的事端，我的心已体察到了。当细微的事情，大家不曾察觉的时候，我的心中已显现出来了。所以君子独处的时候要十分谨慎小心，不要使不正当的欲望潜滋暗长。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说：“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致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慎独”与“慎德”这两个词，大同小异。《大学》中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43]。意思是说，所以国君要首先十分小心谨慎，时时持守自己的道德。可见，“慎独”、“慎德”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修养之道德行为，人人都必须慎独、慎德，虽独居也不能须臾离道，加强品德修养。古往今来，许多杰出人物如诸葛亮、范仲淹等人在“慎独”、“慎德”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精神境界。

韦天宝在论述“士”的道德修养方面，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絮矩之道”和“慎独”、“慎德”的思想。他有时用“慎德”，有时用“慎独”。他指出：“大学以平天下为极，而其实皆自吾心而推之，此之谓絮矩之道，即所谓器识也。絮矩之道，无间于内外，无间于远迩。苟致力于此即穷，而在下则慎独以求自谦。”意思是说，要穷尽大学中所说的使天下太平之理，其实都从自己内心开始，推己及人，这就是所谓的絮矩之道，也就是器识之理。推己及人，在道德上带头垂范，树立榜样，这个道理，不区分内外，不间隔远近，只在自己的心中。如果能致力于穷尽这个道理，就应以居于底下之位独处时十分谨慎小心、注意品德修养为最大的满足。韦天宝的这些论述，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絮矩之道”和慎德、慎独思想，也是相似或是接近的。

（四）素位持守的处世之道。韦天宝论述絮矩慎独的品行修养之后，阐发他素位持守的处世之道。他说：“其行己也，不过人孝出弟，素位而行。其应事接物也，不过一介不与，一介不取，持守坚定，而其胸臆之间，已有天下为己任之思。此其器已大，其识已远也。”

“行己”出自《论语》。“子曰：‘行己有耻’”，^[44]。这是孔子答复子贡问“何谓之

士”时说的。孔子把当时之士分为三等。第一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是说为士不仅要有高深学知，而且重视自身道德修养，行事知耻，谨慎检点，受命出使，胜任愉快，不负君王之所托，为国争光，完成使命。凡具备了这些才能的，才称得上是士之上者。其次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这是指那些在宗族中被称为孝敬父母，在乡党里被赞为友于兄弟，恭敬家长，孝弟双全的人。再次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因为“言必信，行必果”是为人处世本应做到的基本条件，不能算是难以达到的要求^[45]。这种人不一定能像“上士”那样处理重大事情，也不像“中士”那样谨守为人之本的孝弟。韦天宝在这里说的“其行己也，不过入孝出弟”，显然是就“中士”而言的。

“素位而行”出自《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46]。意思是说，君子安心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做本分的事，不存分外之想。君子为人处世，在怎样的地位上，就安之若素，不希望做地位以外的事。这是具有高尚品德的表现。韦天宝所说的“素位而行”，也就是要操守素位，安于本分，坚守常道。

结合《论语》“行己”的含义和《中庸》“素其位而行”的意义，对韦天宝素位持守的处世之道的那段话就好理解了。整段话是说，对自己的品行道德、立身行事，要有严格的要求，在家要孝顺父母，遵守孝道；出外应讲求友爱，兄友弟恭，互敬互爱；各自安于所处的地位，操守本分，不要去做非分的地位以外的事。立身行事，待人接物，严于律己，各守本分，很小的事也不要轻易许诺，细微的东西也不能妄为索取。应该持守此道，坚定不移。这样，就能胸怀大志，内心之中也就时常思考“以天下为己任”的大道理。于是，就可以认识万事万物，心中的知识就越来越丰富，见识也就逐步深远。在这里，韦天宝把处世之道和认识过程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韦天宝还以具体的例证来说明他的素位持守的处世哲学。他说：“三代之上如伊尹，圣门之中如颜曾是也；三代以下如武侯。”伊尹博学多才，品德高尚，辅佐商汤，治理商邑，逐渐强大，终于取代夏桀，建立商朝。伊尹功大盖主，但他操守素位，安于职守，不谋地位以外的事，传为佳话，名垂青史。颜回、曾参是孔子最得意之门生之一，他们奋发苦学，多才多艺，但能安守本分，修养德行，弘扬孔学，后人赞叹，青史留名。武侯孔明，雄才大略，尽心事主，善待关张，恭敬左右，建立蜀国，功勋卓著；后佐阿斗，全心全意，高风亮节，一丝不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流芳百世，历代颂扬。韦天宝认为，这些人物就是“士”的楷模、榜样。

韦天宝特别称赞武侯孔明，说他“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亦庶几近之而要。皆自致力于身心性命中来也。而要皆其所自有也，此则士之所为器识也。如此，乃足以为士。故士不易为也。必如此为士，乃能自立于天地古今之际，故士不可不为也。”就是说，像武侯孔明那样的“士”，淡泊名利，明确志向，安之若素，静观局时，致力

于远大目标，就是很完整地掌握了素位持守的处世哲学之精要。这些都是致力于自身内心德性的修养而得来的。但其主要精神又都是自己内心所固有的，这就是作“士”应该掌握的“器识之道”。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就足以修养成为士了。所以士不是轻而易举可以修养成就的。但又必须几经磨练，艰苦努力，勤奋学习，修身养性，安于素位，持守本分，积德行善。经过这样高度自觉的自我修养而成为士，才能真正自立于天地古今。这是国家和社稷所需要的。所以是不能没有士的。

韦天宝通过论述素位持守的处世之道，阐明了自我修养成为“士”的艰巨性、可能性和重要性，回应了短文开头提出的问题，表明了他的思想前后的一致性。

(五) 弘毅居敬的修行途径。韦天宝在其短文的最后说：“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者，器之大而能受也；毅者，识之远而能守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来看引语的出处及含义。

“士不可以不弘毅”出自《论语》。原文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7]其意为：“士”的胸襟不能不宽宏，志气不可以不刚毅。因为他们要承担起重大的责任，面对遥远的人生道路。要把实行仁德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个担子不是很重吗？这个责任要终身承担，至死不渝，这条道路不是很遥远吗？

韦天宝的引语，意思是说，像曾子所教导那样，作为“士”，胸襟不能不宽宏，志气不可以不刚毅。只有胸怀宽阔，器量宏大，才能穷尽万事万物之理。只有意志刚强，毅力坚定持久，毫不动摇，见识才能深远，知识才会渊博，并持守恒久。只有修养成为这样的“士”，才是治国、平天下所需要的。

然而，光有宽阔的胸怀，宏大的器量，刚强的意志，坚定持久的毅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居敬持志的为学、穷理工夫。所以，韦天宝强调说：“居敬以为主，其工夫之次第，亦如大学所谓格致诚正者而已。”

“居敬”、“工夫”是朱熹阐述体知主体之修养时论及的。朱熹说过“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48]。他以“人心之灵，莫不有知”的“人心”为体知主体，即主体人心具有体知的能力；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的“天下之物”为体知客体，即物理是体知的对象，这就是“知在我，理在物”^[49]。朱熹非常重视体知主体的修养，他说：“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50]。可见，为学的进路就是：居敬——致精——读书——穷理。而要穷尽事物之理，必须首先居敬持志。居敬是进入为学之道的唯一途径，也就是切入口。关于居敬与穷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朱熹说：“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51]。那么，居敬的含义是什么？朱熹认为必须“正

衣冠”，“肃容貌”，“整思虑”，“收拾自家精神”^[52]，就是说，为学必须衣冠整齐，仪表端庄，容貌清结，端正内在思虑，去掉一切私欲邪念，保持旺盛的斗志，饱满的精神。很显然，居敬工夫到家了，自然就可以穷尽事物之理。

韦天宝对居敬工夫非常重视，他认为，要把自己修养成为士，必须把居敬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从内到外，整齐清结，庄重严肃，端正内心，表里如一，不被外物所诱，不被邪念所惑。而居敬工夫的次第或程序，就是像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从物到心的程序看，首先对事物之理一一推究明白，然后才会拥有渊博的知识，彻底了解事物；拥有渊博的知识，彻底了解事物，然后意念才会诚实；意念诚实，内心才会端正而无邪念。从心到物的程序看，要端正内心而无邪念，必须意念诚实；意念诚实，才会彻底了解事物，拥有渊博的知识；彻底了解事物，拥有渊博的知识，才能穷尽事物之理。这是韦天宝高度概括“士”这种人才进行自我修养的两条路径，是对《大学》有关内容融会贯通的深刻理解。

（六）关心民瘼，改革政弊的历史观。同情农民苦难，“哀民生之多艰”，是屈原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思想。这种思想在壮族知识分子当中也多有反映。韦天宝是众多壮族知识分子当中具有体察民情、关心民瘼之思想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

韦天宝关心民瘼，哀怜民生多艰，同情农民苦难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抵凤署感作》一诗和《凤山救弊条例》一文，归纳起来有三点：

第一，深入实际，体察民情的格物行动。如前所述，清嘉庆二十一年（1817年），韦天宝已到而立之年，时有凤山韦姓土官礼聘他去作幕宾。武鸣到凤山，五、六百里。崎岖山道，路途遥远。从武鸣出发到达凤山，韦天宝整整走了10天。赴任途中，他深入山村，体察民情。他亲眼目睹了十九世纪前期广西壮族人民在土司统治下的悲惨境况，十分愤慨，于是写下了沿途见闻的感慨之作——《抵凤署感作》，饱和着凄楚的情感：

十日兰阳道，穷檐不忍看！
官贫征赋急，丁少避徭难。
鸡黍供宾减，人烟入望寒！
轺轩谁下问，康济苦无端！^[53]

东兰和凤山改流之前，原同为一个土州，名为东兰州，又称兰阳。雍正七年（1729年），东兰州开始改流。改流后，一分为二，东兰由流官管辖，割凤山归土官统治。凤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完成改流。韦天宝赴任的十日路程，察看了沿途农村：穷檐旧宇，衰微破败，徭役繁多，赋税沉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山区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果他招摇过市，游山玩水，走马观花，

而没有深入山村，体察民情，了解实际，是不会写出如此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农村苦难状况和社会现实生活的诗作来的。韦天宝在《士先器识论》中，充分阐述了他器识性心、格物致知、絮矩慎德、素位持守、弘毅居敬的思想。他利用到凤山当官的机会，赴任途中，深入实际，体察民情，了解情况，这应该说是深受他格物致知、絮矩慎德、居敬持志、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影响的。

第二，关心民瘼，慷慨济苦的民本思想。韦天宝接受当时凤山土官的厚礼聘请，赴任途中考察了山区农村，写下了《抵凤署感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山区农村的凄惨境况和农民苦不堪言的非人生活。这表明他关心民瘼，同情人民。因而他曾萌发慷慨解囊、济贫救苦的思想，即“康济”。然而，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上层社会的腐朽，阶级剥削的残酷，农村衰微破败，农民贫穷落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苦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康济”农村广大贫苦农民是可想而不可及，很难办到的。韦天宝深刻认识到这些历史条件和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虽有解救人民于水火、关心民瘼的深厚感情，却无救世、平天下的良方，因而他只能发出“苦无端”的哀叹。“康济苦无端”，是韦天宝民本思想最深刻地反映与体现。

第三，谴责官僚，改革政弊的治平主张。韦天宝赴凤山任职，看到沿途农村破败、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的情况，本以为“官贫征赋急”即土官也是清贫可矜的。后来知道并非如此，实际上土官奢侈贪婪，出入车马，醉生梦死，不问政事，无视民情。于是，他非常愤慨，发出了“輶轩谁下问”的斥责与呐喊。“輶”是古代一种轻便的车，“轩”为古代一种前顶高，上面有帷幕的车。“輶轩”应指当时土衙官员出入经常乘坐的一种较为豪华的车。就是说，面对农村的破败与凋零，民众的苦难与凄惨，坐在豪华车上的官员有谁“下问”、关心、同情过？！韦天宝愤激之余，于是挥笔写了一篇《凤山救弊条议》，洋洋数千言，建议改革凤山弊政，破除陈规戒律与旧观习俗，免除部分徭役和赋税，减轻民众负担，发展农业生产^[54]。联系到韦天宝在《士先器识论》一文所说：“欲诚意以正心，必先知之所当，诚之为善为恶”以及“素位而行，其应事接物也，不过一介不与，一介不取，持守坚定，而其胸臆之间，已有天下为己任之思”这些思想，应该说是深深地影响着他改革凤山政弊的建议与主张。可惜凤署土官对他的改革主张充耳不闻，使他大失所望，愤懑而辞归故里。

韦天宝改革凤山政弊的建议与主张在当时虽然无法实现，然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一方面反映他关心民瘼的民本思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他力图在一方之土实践其“格物致知”、“絮矩慎德”、“素位居敬”、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韦丰华（1821-1905）字剑城，号明山，别名大明山散人，广西武缘县（今武鸣县）陆斡韦静村人。其祖父韦有刚是举人，永宁州学正。父亲韦天宝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进士,中进士后赴任四川留住成都时因病逝世,韦丰华就是这年出世的,是韦天宝的遗腹子。韦丰华就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家庭。他自幼由母亲抚养,家境宽裕,秀颖脱俗,天资较好,5岁上学,11岁就读县署,受名师调教,学业长进较快,后进入桂林秀峰书院深造,才华显露。韦丰华虽有家学传统,但功名仕途却不似乃父的顺利。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他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遍及岭峽的农民革命运动使他极度不安,离家逃难,经商糊口,还组织团练维护“桑梓”的地主阶级利益,和农民军进行了多年的较量。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镇压后,他转而积极地致力于科举,终于在1866年45岁时得一拔贡。中年得志,大喜过望,旋即进京应试,落拓潦倒而归。仕途不顺,才学永存,名声在外,他先后受聘为武缘、宾阳、阳明、西甯、岭山等书院的山长,教授生徒,培养后学。就聘各书院山长期间,韦丰华致力功名的意志不减,直到58岁,仍时常应试。然而,时运不佳奈何如?“秋闱七试不登科,一领青衫耐折磨”^[55],仍然未举于乡。但他始终不忘训导后进,教书育人,培养了许多学生,继承刘定迪、张鹏展、郑献甫的传统,对壮族思想文化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他著有《今是山房吟草》七卷,存诗数百首;《今是房山吟余琐记》五卷,以粤西地方的文化艺术为主,间及历史、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和地方掌故,草草随录,保存了许多可贵的精神资料。

(一)“正心术”、“明学术”、“振文风”,“品端洁而行轨”的教育思想。韦丰华一生仕途不顺,“七试不登科”。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颓废,虚度年华,而是振奋精神,从事教育,启迪后进,培养人才。他从教几十年,自琴泉义学教书生涯伊始,以后历任许多书院山长,直到80岁时,才告老还乡。在长期的教书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育人经验,因而提出了学识与品德兼有的教育思想。这个思想,一反当时八股学究、僵化教条的习气,是“积习如今当变革”的尝试。韦丰华认为,“国家以文取士,不要徒取其文”,要重视“人才禀性朴实,学有根底,品端洁而行轨”^[56]的培养。就是说,为国家培养人才,既要注重丰厚的文化知识,又要加强品德修养。因此,他主张,要使生徒“正心术,明学术,端士习以振文风”。这是韦丰华多次应试不第,看透科场的黑暗而形成的思想。如前所述,韦丰华45岁时才得到一个拔贡,之后多次赴京应试,都金榜无名。他怀才不遇,常发感慨之情:

才华学问归何用,怅对寒灯思惘然。

误入名场数十年,平生潦倒傅尘缘。

青衫一领惭依旧,白发千茎笑独先。^[56]

这是他对科举考试的愤懑。与此同时,它还愤然揭露了科举制度的黑暗:

念彼取士者,岂可重文章?念彼授职者,岂惟尊贤良?

嗟予非钟王,科名安能扬?嗟予非况邓,官运安能昌?

万里京国游，彷徨空彷徨！^[57]

按照清朝的传统，本来应试后看卷面的字迹，以“黑大方光”的“楷体”为标准。考中以后授官，必以财礼为贿，是官场的常情。韦丰华对这套规矩非常愤慨。特别是他对科举制度彻底失望之后而对这种制度加以严厉的谴责：

八股文章八韵诗，磨人直到白头时。

京华马足车尘里，有几英雄不皱眉！^[58]

这是韦丰华穷愁潦倒，走投无路而逼出来的诗，是灵魂的呐喊，生命的倾诉，为数百年来千百万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吐出了冤气！足以见出科举制度笼络人心，扼杀才华是如何的毒辣冷酷！韦丰华凭一时之气，似乎看透一切，写了这么深刻的诗，然而，时过境迁，他还是不甘寂寞的，又连续参加三次乡试，到 58 岁，才最终承认失败：

千里归来客，依然一散人。芒鞋如恋足，席帽未离身。

前路无知己，今生命不展。名场多苦恼，误我是儒巾！^[59]

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从名场中真正觉悟过来，及早抽身的有识之士是不多的。虽然韦丰华没有及早抽身离开功名科场，直到 58 岁才反思醒悟。但他一旦醒悟之后，在自己的从教生涯中，提出学识与品德并重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在功名利禄熏心，八股时文猖獗年代，它的这种思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二)“真情实感”的创作思想中所体现的反映论观念萌芽。韦丰华一生留心于诗歌创作，形成自己的创作思想。他认为：“作诗者抚景沉吟，必有一段真情融结其间，乃得超然特出，然则，虽描摹填砌，工整严密，神趣终于枯竭，是犹土木偶人，塑得端重庄严，令人触目起敬，究不如一花一鸟之飞扬活动，妙有天趣，足使人目遇之而神不觉为之往也”^[60]。这里的“真情”，就是真实情况，客观实际。作诗要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客观实际。就是说，诗歌有真情实感，才能获得生命力，这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的经常议题，韦丰华对此研究很深，发挥得如此浅显明白，通俗易懂，奉为创作的指南，在壮族文人中是不多见的。他还强调必须以“真情实感”贯穿于诗歌创作的全过程：“作诗者必有作诗之三长，乃得佳句，无才则落笔必庸俗，无学则出言必浅薄，无识则命意必卑鄙，而具三长者，又必以真性情贯之”。而杜甫“之所以贯绝古今者”，在于兼有三长，而又“真性情也”^[60]。这些话不无道理。因而，韦丰华的诗歌，不作无病呻吟，毫无空洞胡扯，而是富有社会内容，主旨非常鲜明。他在这里讲的虽然是诗歌创作，但却具有方法论意义。强调“真情”实感、“真性情”，就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反映客观实在，不附加任何主观的成分。这就有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是朴素的，不自觉的，但却是难能可贵的。

(三)同情民众疾苦，抨击贪官污吏的怜民鄙恶思想。韦丰华按照“真性情”的

反映论观念，写了许多有关农民起义的诗作，可惜他受地主阶级封建思想的约束，抱着敌对态度，只看到农军攻城掠地、“拉生”报复的暴烈行为，而不究其深刻原因，没有在意诗歌的艺术形象中客观的反映出农民起义活动的本质。这是他思想的局限性。而在描述农村现状、反映民众疾苦、揭发剥削压迫、抨击人情世故、鄙弃土豪劣绅的作品，却比较客观的反映了社会现实，有比较多的社会意义。且看他的一组抒写民众疾苦生活的诗歌：

蒿目愁如织，鲜民不忍看。啼饥悲载道，济变思无端。
此辈虽为命，伊谁正在官？偏隅兵燹后，何计救愁残？^[61]

儒流雅抱济时情，未可为霖愧此生。
最是酸心难自道，啼饥不绝款门声。^[62]

连旬粥厂四厢开，鹄面鸠形逐队来。
当道争夸恩下逮，依然饿殍半蒿来。^[63]

升平气运转鸿钧，临浦波光亦作春。
不道东皇恩泽渥，满城荆棘尚争新。^[64]

名成利就乐如何，得意春风有客多。
知否呼庚人载道，宵深高阁尚笙歌。^[65]

这是韦丰华 46 岁在广西宾阳参加“科试”时的即目感吟。当时，广西各地起义农民已被镇压下去，沾满农民鲜血的封建统治者缓过气来，仿佛歌舞“升平”、“运转鸿钧”、“波光作春”，可以普天同庆了。而广大农村竟是一片凄惶，满城荆棘，鹄面鸠形，流离失所，啼饥载道，饿殍遍野，生灵涂炭，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他借春风雨露荆棘争新的荒寂景象，与“皇恩泽渥”偏偏饿殍遍野的悲惨场面相互映照，对比反差。非常清楚，他同情民众疾苦、谴责贪官污吏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他正面揭破“当道”官吏藉施粥赈济的名义夸饰“德政”，“济变无端”，虚报冒领，中饱私囊；再将饥民的深夜呼号“呼庚人载道”和官吏们的笙歌行乐“宵深高阁尚笙歌”作鲜明对比，在诗歌中展示了“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了，统治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却在继续发展，韦丰华以自己的诗歌作了见证。应该指出的是，韦丰华一向反对农民起义，面对现实，却又为自己的救世无方深感愧疚，无情地抨击贪官污吏，同情人民的苦难。

韦丰华还认为，旱灾酿成饥荒，统治阶级却漠然置之，是人民铤而走险的重要原

因之一。韦丰华和许多壮族知识分子一样，基于同情民众疾苦的思想，前后数十年间不断揭示这个主题，写出一些很有内容的诗文。他在50岁后写的《秋旱即目书感四首》、《夜坐盼雨书怀》等诗篇，就沉痛地提到：“粒米贵如珠，沟壑转衰朽。民贫竞为盗，兵勇纷纷凑”；75岁时还说到滇黔一带地方，“呼庚满听相途属，鬻子充饥价不昂”[66]。这些诗句，企盼着社会对“民贫竞为盗”的理解，反映出他对民众疾苦的无限同情。

韦丰华在《谈时艰有感八首》所揭露的粤西农村凄惨景象更是触目惊心。现录几首：

十室真九空，谋生倍着忙。资难金粟借，价并木茹昂。
颗粒珠玑等，皮根草木尝。当途多瓦石，安得化为粮！^[67]

纷纷行道客，大半是流移。比屋居皆病，沿门乞问谁？
倾囊慳饿妇，复钵顾啼儿。有腹都求饱，何从得肉糜！^[68]

饿殍几盈野，哀怜浪有情。群羊悲鲜饱，涸鲋悼多生。
未被推恩及，难防攘食横。不图筹救急，遇余令偏行！^[69]

十九世纪末年广西农村社会就是这种惨不忍睹的现实：十室九空，道途流移，比屋皆病，乞讨无处，饿殍盈野，饥妇空钵，稚子啼号；而官府还是不肯“推恩”救急，反而“遇余”不卖；致使“粒米贵如珠”，“皮根草木尝”，因此“难防攘食横”。为什么在广西的近代史上，会党纷起，游勇遍地，农民起事前仆后继，新旧军接踵而至，难道不是天灾人祸、官逼民反所造成的吗？韦丰华通过对“官逼民反”社会原因的深刻揭示，进一步体现了他同情民众疾苦、抨击贪官污吏的思想倾向。

（四）搞好人际关系誓不攀龙附凤的清廉思想。韦丰华长期生活在乡村小镇，耳闻目睹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接触各类人物，关注交往关系，揽入眼底笔端，交织成为纷繁复的生活图景，同时揭破图景背后的社会本质，写出一些很有思想意义的诗歌。他在《杂感诗四首》写道：

世情看冷暖，人面看高低。初心不谓然，立棘久方知。
富贵震时俗，穷贱求提携。华门两扇开，匍匐争攀跻。
得宠驾车马，失宠推污泥。权势倾乡里，望尘咸噫噫。
岂意造物巧，顷刻能转移。显赫忽坠落，亲厚皆乖睽。
门前张雀罗，欢笑易悲啼。怨者相倾轧，爱者亦排挤。
花艳难久开，月圆终必亏。寄语当途辈，宜慎得志时。^[70]

在韦丰华看来，不应该以贫寒富裕来处理人情世故，也不应该以职位高低来衡量交往应对。他对社会上的一些人以家境“冷暖”为标准、以职位“高低”为尺度来处

世行事、待人接物非常厌恶，对“穷贱求提携”、“匍匐争攀跻”之流也极为鄙视。他认为，“富贵”与“穷贱”，“权势”与平民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花艳难久开，月圆终必亏”。因此，他语重心长地劝告权势者“宜慎得志时”，不要忘乎所以，权利熏心，为所欲为。他对那些得志一时、横行乡里、胡作非为的土官土目、豪绅恶霸无比鄙弃憎恶。他在友人扇面上随手挥就的两首《镇阳感事诗》道：

辨丝纱带逞英风，不畏王章漫自雄。大馆虎威狐竟假，更谁怜彼磕头虫。^[71]

直道难行是此秋，正言谏论总招尤。孰嗤端谨尘中士，学得乌龟尽缩头。^[72]

镇阳在广西上林山区，李姓土巡检世袭管辖，有屯丁数十，好不威风；这般骑在人民头上顾盼自雄，在官府权要面前则是磕头虫的英雄们，是横行乡里的好汉，又是恭谨唯诺的缩头乌龟。韦丰华为谁画像？他说，友人覃墨波看到扇面题诗后深为忧虑，劝持扇者不可随便示人，“恐为豪者所岂”，因为诗意深合西林一带洪门会起义农民的心理^[73]。可见，韦丰华矛头所向正是豪绅恶霸，或者就是土官土目之类。他们狐假虎威，称王称霸，胡作非为，鱼肉百姓；而在官僚大吏们面前他们又装出另一副脸孔，即“磕头虫”、“缩头乌龟”。韦丰华通过形象风貌的几笔勾画，准确地揭示出当时壮族统治阶级人物微妙的身份和心理，表达了鄙弃憎恶的感情。

韦芹塘 清思恩（今广西环江县）人，道光末举人，曾赴京会试，不第而归，曾建民团。主持环江书院教务，有诗名，著有《戒洋烟赋》、《今日安闲恃父兄》，曾汉译壮族排歌14首，虽有文人加工之痕迹，但仍不失民歌风味。

韦陟云 字邠五，广西象州人，生于道光末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举人。光绪年间，在京作过较长时间的户部主事，光绪十六年（1890年）请假回乡，次年受人牵连，在家候审，三年后奉命晋京羁栖待命。闲居数年，写了不少诗篇，又“忆前此之散佚者”，将它们辑而合编成帙，这就是《红杏山房诗稿》。有民国八年（1919年）手抄本，前有光绪二十年（1894年）自序和孙家鼐序。孙家鼐为之作序云：抒写情怀，流连光景，皆正和平，无剑拔弩张之态。最能表现诗人政治情怀和艺术气质的作品要数两首七言歌行《连城行赠苏大元帅》和《南关行赠马副帅》以及五言长律《羁栖四十韵》。两首七言歌行是作者受到当时南疆边防大吏苏元春和马盛治的热情款待后于归途中的回忆之作。赞扬他的抗击法国侵略者的丰功伟绩，同时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羁栖四十韵》将近年时事经历总揽于笔底，指占评论，借此一抒不平的心绪。作品规模宏阔，结构严整，洋溢着诚挚的爱国情绪。

韦麟阁 生于道光年间中期，广西永宁（今永福县属）人。精研史学，功名不就。他好作寓言诗，揭示人类社会的各种阴暗特征，即攘夺纷争，尔虞我诈，豺狼当道，弱肉强食。著有《小舟别墅遗集》，有民国十六年（1927年）石印本，由其子韦绣孟等搜集整理刊行，绣孟挚友阳颌为之作序。分《小舟别野遗集》和《庚甲诸遗集》两部

分，又附《课孙吟》长排律及倡和诗3首，共收诗170余首。阳颌在《小舟别墅遗集》序中说：“多忧民念乱，声情激越之作，少陵（杜甫）嫡派也，咏物寄意，即景言情，则又深得风人比兴之体，而藻不妄抒，寄慨尤深。”

韦绣孟（1856-1929）字峰芝，号茹芝山人，中渡（今鹿寨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韦布泽，通经史，喜诗书；父亲韦麟阁，精史学，擅诗赋，著有《小舟别墅遗集》传世。韦绣孟自小受到文化熏陶，加上禀赋较好，学业长进也快，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入京应选拔贡。然而，时运不佳，初选不利，便转入国子监补习，并以教习供职镶黄旗官学，时间达7年之久。光绪十九年（1893年）教习期满，以知县备用，由京城返故乡住数日，便赴山东候补。至宣统元年巳酉（1909年）止，居住山东17年。除1900年任短时间金乡县代理知县外，大部分时间依人作客，有时应一些杂差，心颇抑郁。宣统元年春，因父病故，急从山东返回故乡，从此不再复出，往来于桂林、中渡两地，日以议论国事、吟咏访友为务。民国十八年（1929年）病故。

韦绣孟手订的按年编排的《茹芝山房吟草》^[74]，这是他留给后人精神食粮的第一手资料。

韦绣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主要有：

（一）**尊孔崇儒意识**。如前所述，韦绣孟在国学监教习期满，赴山东以知县候补备用，居住山东长达17年之久。在山东期间，除了忙于公务之外，他登东山，即孔子当年登过的东山，参加祀圣日活动，考察孔子居住的地方，调研孔子聚徒讲学的情况，从而对孔子景仰有加，对儒学崇敬至极。这种深厚真挚的情感，体现在他的诗作字里行间。他在《登东山放歌》中道：“不闻孔子言，五十知天命。渐造渐自然，耳顺心从惟吾令”。“我来且作东山游，小鲁襟怀回莫俦。阙里宫墙崇万古，杏坛礼乐祀千秋”^[75]。

韦绣孟居住山东长达17年之久，通过各方面了解、考察孔子的学习、生活，高度概括出孔子一生“渐造渐自然，耳顺心从”的循序渐进、自我造就、日臻成熟、完善提高之历程。韦绣孟的《登东山放歌》这些诗句寓意丰富，含义深刻，表现了他对孔子景仰、崇敬的深厚感情，要修养到老，始终遵循儒家学说待人行事。

韦绣孟在《祀圣日恭纪》中写道：

伛偻来登夫子堂，就亲道貌已恩光。遗经四壁嵌碑质，古桧一株倚石苍。

牺象尊严周鼎彝，龙文璀璨汉冠裳。趋归忍把朝山拂，杏坛犹沾两袖香。

大道弥天自古今，腐儒何福此停琴？枢衣忝附公家祭，莫学难酬私淑心。

金碧官墙真美富，冕旒坛席足高深。诗成待付知音赏，曾踏东山顶上吟。^[76]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韦绣孟通过对参加祭祀孔子礼仪过程的维肖微妙的描述，充分反映了他对圣人的无限崇敬和景仰。他毕恭毕敬、弯腰曲背地走进孔夫子的庙堂，就亲身感觉到圣人恩德及人，就像雨露滋润草木、阳光普照大地一样。孔庙里，

古树桧柏，倚石苍翠，各种殿堂，金碧辉煌，宫墙四壁镶嵌着贵重的遗留经书，墨客文人赞颂圣人的众多碑刻，质地精美；历代皇帝恩赐圣人的“龙文”璀璨夺目。人们用古老而珍贵的“鼐鼎”这种大祭器盛着“牺象”这种做祭品用的牲畜隆重地祭祀圣人。于是，诗人参加祀圣归来，不忍心弹拂身着的朝拜长衫，因为“杏坛”（即孔子精心授徒、功成名就的地方）浓厚的学习风气仍在两袖飘香。因此，诗人无限感慨地说，圣人创立的儒学大道自古至今天下广为流传，而自己这个“腐儒”没有福分在这里停留聆听圣人讲授，只能提起衣服的前襟，惭愧地跟随众人前来参加祭祀，这些都无法表达自我对圣人的恭敬之心、崇拜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韦绣孟对孔子儒学的景仰、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二）反对清廷乞和投降丧权辱国的爱国思想。近现代的壮族知识分子，处在内忧外患的动荡社会之中。因此，他们的爱国热情强烈，爱国思想突出。他们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强烈反对外国列强的入侵、欺凌。特别是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处于危险艰难时刻、生死存亡关头，他们都以自己的诗作呐喊出爱国主义的强音。在众多的壮族爱国知识分子当中，韦绣孟和黄焕中一样，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韦绣孟的爱国主义思想，有多方面的反映和体现。

1. 反对清廷卖国求和的罪恶行径

他在《甲申感事》中写道：

其一

越雒不闻再入关，狼封豕突又连山。中朝将帅辜恩久，异族旌旗列阵殷。
王翦备兵能死敌，班超投笔竞生还。伏波铜柱今安在，已界烟蛮雾瘴间。

其二

变守为攻战复和，风云扰攘日生波。尘氛交广飞鹰疾，秋入滇黔怒马多。
五月渡泸怀诸葛，十年按剑有廉颇。戎机一误南疆挫，大笑先生魏绛讹！^[77]

这两首诗是为中法之战而作的。1883年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把越南变成自己的“保护国”。1883年12月，法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时，越南向中国求援。当时，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英勇抗法，取得了重大胜利；岑毓英、冯子材也分别在云南、广西挫败法军。然而，清廷却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边关守将岑毓英、冯子材坚决抗法、英勇善战，不断挫败法军侵犯的嚣张气焰。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春，法军再次大举进犯，广西守将黄桂兰军溃退，唐炯贪生怕死、临阵逃亡退入云南，广西巡抚潘鼎新逃回镇南关（今友谊关）。更为可恨的是，在法军穷凶极恶进犯攻陷谅山时，李鸿章极力主和，并于1885年受清廷重托与法国侵略者在天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即《中法新约》，承认法国侵占越南，允许法国在云南、广西自由通商等。韦绣孟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这两首诗，谴责帝国主

义的骄横。清廷官兵的腐败无能，以及李鸿章之流妥协投降、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魏绛，本是春秋时主张与山戎讲和的晋大夫，这里用来指代李鸿章。值得注意的是，韦绣孟写这首诗时，赴试北京的时间已经迫近，他正在紧张地准备功课。然而民族的灾难在煎熬着他，使他不能专心致志于学业，这种爱国热忱是十分宝贵的，对他来说，忧国忧民已是浹髓沦肌，随时都想一吐为快。

2. 揭露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

在抗击法军期间，韦绣孟赴京应试。在北京时他写下了《畿辅四时词》四首：

其一

相公今又进姚黄，天子曾呼太白狂。一簇牡丹十万赋，两朝殷鉴昧平章。

其二

妙制新撑太乙莲，榻来陆地有神仙。风清瀛海波如镜，四月南熏柳拂天。

其三

菊花斗艳叠成山，大隐风流满市园。何以篱东陶靖节，楼枝摇曳夕阳殷。

其四

易水风寒壮士歌，哀音激越诉铃驼。中朝士马轻如鲫，日逐将军镇漠河。^[78]

这四首诗，韦绣孟将京城中达官贵人、封建统治者奢侈豪华的优裕生活与守边御敌、抗击列强将士的艰苦处境作了比较，表达了他对于贵族官僚的士马优游、侈丽豪奢、歌舞助兴的糜烂生活之斥责，而对守疆戍边将士的战斗生活、艰苦处境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安慰，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主义的深厚感情。

3. 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挞伐与针砭

韦绣孟在《感事六首》中写道：

其一

衅起仓皇鼎祚移，乘舆南望竟无之。满朝文武谈兵日，四海妖魅斗战时。
东市惨闻兴大狱，北平昨已殒灵旗。勤王忠勇推甘陇，一旅提携安拯危。

其二

翠华西去肯重回，莽荡乾坤事可哀。未必削藩能弭患，要知御侮正需材。
木经再实本先拔，玉到俱焚气早灰。怆念懿亲沦落尽，椎心争究祸谁胎。

其三

泣血摧肝敌灭无，诸公毕竟昧良图。坐看妖焰风云变，哪有神兵草木驱。
累叶簪缨归劫尽，九朝陵寝废邱墟。全权倘副均衡任，日月重轮大雅扶。

其四

此后朝阳门洞开，更无人问禁兵来。铜驼荆棘秋烟冷，玉竦楼台画角哀。
尸谏司成光竹简，扈从元相走蒿莱。神州复旦知何日，一饭芜亭万乘摧。

其五

转撼当年错铸成，洋氛始终逼圆明。通商五口自开港，问罪六师纷驻京。
变法建臣难任法，青城乱党促盟城。黄巾已兆桓灵运，杀贼何堪仗绿营。

其六

频年转饷竭民膏，寇至三军早遁逃。一矢未加原我怯，百端相胁让人骄。
祸延甲午尝多款，机失庚申约数条。太息伊犁兼马尾，助成馊焰恨滔滔。^[79]

这首诗写于辛丑花月，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农历二月。众所周知，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借口清政府“排外”而肆意侵略中国，于当年6月攻占大沽口炮台，7月侵占天津，8月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满朝文武仓皇西逃，令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八国联军乞和。八国侵略军乘势攻占山海关、保定、正定，直至山西。沙皇俄国则独以兵力侵占东北。诗人痛心疾首，无限愤慨，“东市惨闻兴大狱，北平昨已殒灵旗”。1901年9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来又签定了《马关条约》《伊犁条约》。从此，中国割地赔款，任人主宰，国势日衰。对此，韦绣孟非常悲愤，严厉斥责朝廷：“怆念懿亲沦落尽，椎心争究祸谁胎”？“祸延甲午尝多款，机失庚申约数条。太息伊犁兼马尾，助成馊焰恨滔滔”。他对贪生怕死、“仓皇”“遁逃”的慈禧、光绪及满朝文武无比憎恨；他发出了“神州复旦知何日”的感叹。这组诗作，主题鲜明，使人深思，促人觉醒，充分表现了韦绣孟热爱祖国的深厚情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

（三）忧国忧民与“宇宙大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忧国忧民，完全是韦绣孟的一种自觉意识，而不是趋赴时髦、附庸风雅。他全神贯注于时局变化，世事发展，即使是登山临水、友朋酬唱，也是愁绪满怀，不能自己。他的许多诗篇都反应这种思想，危机感和责任感始终构成他的思想之主体。他在《羊城》诗中用“翻羨时清诸福将，灯红酒绿醉谈兵”^[80]句来嘲讽将领们不上前线抵御外侮，却躲在大城市尽情享乐，空谈兵事的丑恶行为；他极端厌恶“巢堂燕雀总偷安”^[81]的居安而不思危、毫无远虑的燕雀之见。他勤于思考，不断探索，帝国主义恃强凌弱，中国主权节节丧失，“千钧庙祚延丝发，忍共西京话播迁”^[82]，“怅念两川虎寄命，英雄末路最堪伤”^[83]。他把中国的失败归咎于官兵腐败无能、宰辅重臣的软弱无能，因而他始终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这些人，鞭挞讽刺，痛快淋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他椎心泣血，与全民族一起寻求着最终答案。然而，他始终没能找到。但是，他曾有过的理想和抱负是不能抹杀的。他在山东写成的长篇五古《之罘观海书感得三十韵》集中表述了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

沧海渺一粟，此语诚非夸。乘风破万里，转瞬即天涯。小儒矜蠢测，识陋等鸣蛙。
坐井而观天，望洋兴叹嗟。岂知九州外，群岛纷嵒岬，或拓殖民地，田野富桑麻；或

辟工艺厂，奇巧绚云霞；或炼钢铸炮，或炼金披沙；或电线沉水，或星汉浮渣；蜃雾志礁杆，鱼雷鼓浪权；海权争咫尺；分割极豆瓜；舟车竞所至，人力通夷华；首击尾斯应，阵布长山蛇。比来东亚蹙，英法兵屡加；日俄口张虎，德奥目瞪虾。港澳面而去，越台着着差。匈奴苟未灭，吾何以为家？世局已如此，祸端复萌芽。同室竞操戈，胡乃蛮出蜗？愿为当轴告，神州日未斜。稍纵机即逝，乘隙斯蹈瑕。和戎非善谋，汉宋吾前车。安得岳家军，直捣黄龙衙。商学备战具，天险莫蔽遮。衔石矢精卫，补天师女娲。宇宙倘大同，舳舻声咿哑。海若帖然伏，国际无纷拿。外交一得手，内政良足嘉。朝奋航空艇，夕撑进口划。方域庆砥平，弥望晨光赧。

在这篇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中，韦绣孟正视了欧美日本等国家的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达，他们以坚船利炮进行殖民扩张，承认中国的落后、贫穷，国土不断沦丧，“港澳面而去，越台着着差”；同时认识到，这种落后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造成的，解救的唯一办法是抓住机遇坚决进行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国门，从而实现“宇宙大同”、“方域砥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内政良足嘉”、“弥望晨光赧”，独立富强，“朝奋航空艇，夕撑进口划”，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里，我们看到韦绣孟以少有的浪漫主义热情为当权者开了一剂政治药方，也为国家和民族设计了一幅美妙的社会蓝图。但是，由谁来发动和领导一场全民战争，清政府有无能力当此重任，他没有深入探究；他甚至把起义和革命看成是“同室竞操戈，胡乃蛮出蜗”；他希望“安得岳家军，直捣黄龙衙”和“衔石矢精卫，补天师女娲”，即希望有像岳飞那样的抗敌英雄出现和像精卫填海那样进行坚韧不拔地奋斗，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韦绣孟清楚地告诫当权者们，中国还没有达到不能挽救的地步，只要能抓住帝国主义的弱点，找机会予以痛击，“愿为当轴告，神州日未斜。稍纵机即逝，乘隙斯蹈瑕”，国家就有希望挽危难于将倾；他还批评清朝当局“和戎非善谋”，即一味向帝国主义妥协求和，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同帝国主义签订各种和约。可见，韦绣孟寄希望于即维护现有的政治制度、维护封建秩序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宇宙大同”、“方域砥平”，这就注定了他那乌托邦式的理想和其他壮族文人的社会理想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韦绣孟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大胆地号召赶走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宇宙大同”、“方域庆砥平”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却是难能可贵的。

韦绣苏 (? -1905)号眉山，字海之（或作“芝”），韦麟阁之三子，韦绣孟之弟。桂林逊业堂肄业。曾撰《王猛论叔孙通赋》、《粤西边防策》等，脍炙人口，刊于当时较有权威的《桂海文澜集》。亦写有不少诗作，不过大多遗失。撰写的《眉山遗稿》，附于韦麟阁《小舟别墅遗集》后，另有2首附于韦绣孟撰《先严好吟咏记》（亦附《小舟别墅遗集》后）。

韦木勋 (1871-1930) 广西凤山县人，为凤山县的末代土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任弹压，1923年任县知事。他天姿聪颖，工于诗画，有不少诗作流传于世。其中《题水源洞》便是有名的一首：

岩里依稀别有天，半潭春水一房禅。
疏钟暮打桥边月，丝鸟时飞洞口烟。
得境意志身事外，入门同是个中仙。
重游感慨山僧老，短夹殷勤煮茗延。

他是土官中不可多得的诗人。

韦秀冕 广西来宾人，生于前清，逝于民国，系前清禀生，遗有《祭孔诞辰》一文，该文写得潇洒自如，水平之高在一韵之奇，一字之巧。文曰：

教泽流芳，千古授裁成之范，生辰纪念，万方称敬祝之觞。恭维至圣先师，天纵多能，世称博学，道德齐高乎二帝，事功远迈夫百王。上昭十六字之心传，斯文一脉，下开千百年之道统，支派长流。生春秋之时，遇衰周之世。桴海致叹，旷野兴歌，列国周游，归裁狂简。自是讲学，设教杏坛，作论语而修春秋，删诗文而定礼乐。传道者三千士，垂教者亿万年·中庸大道，探性理之渊微，大学十章，揭明心之旨示。作师表合万世，历祭祭以千秋。迄今民国改造，制度更张，泮水依然。学生等闲，生当晚境。不获区列门墙，仰盛德之余光，奚啻春风而共坐。

注：①十六字之心法：人心惟色；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②奚啻：伺止。③狂简：谓志大而事疏粗归载，闻正道终身诵之。

韦聿新 广西苍梧平福古地人。清举人。清末留学日本宏文速成师范，回国后在广东中渡、永宁、信都及广西桂平、藤县任县长。1923年离任，去世时家贫如洗、擅长花鸟工笔画，有花鸟画遗作二幅。